《吴越春秋》的叙事策略

林　小　云
(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吴越春秋》独特的叙事策略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叙事策略表现在:建构审美时空形态,展现吴越两国盛衰兴亡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揭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和历史哲理;建立"包举大端"的开头形态,使全书具有一种充满浓烈反省意识和兴衰感的历史哲学思考。

[关键词]　叙事策略;　审美时空形态;　开头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2)03-0097-04

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是记载吴越两国历史的著作。吴越两国的兴亡成败,特别是春秋后期吴越争霸的历史,留给后世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

东汉前期,经历了王莽之乱,政权始建,稳定秩序、收拾民心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吴越争霸这段历史,它在刚刚经历动乱的东汉前期重新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是不足为奇的。《后汉书·儒林传》载:孔僖与崔骃论史事,以汉武帝比吴王夫差,"有画龙不成反为狗"之叹。崔骃认为,"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圣道,师则先王,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之为善"[1],与夫差的先霸后亡如出一辙。夫差连年征战,不息战火,导致国势急剧败落,最终灭国亡身;武帝征伐四夷,用兵三十余载,西汉前期几十年的积累被他消耗殆尽,致使国力衰落。一亡一衰,历史何其相似!《越绝书》末篇《叙外传记》称:"勾践以来,至乎更始之元,五百余年,吴越相复见于今。百岁一贤,犹为比肩。"[2]

由此看来,袁康、吴平编订《越绝书》也深含以古喻今、借古史警策现实的意义。因此,在这样一种以史为鉴的氛围中,作为今文经学者的赵晔撰写《吴越春秋》也绝不是随意为之的。赵晔本人虽没有序跋之类以强调自己的作书宗旨,但我们从其内容中还是可以了解到他作此书的目的与宗旨的。元代徐天祜在《吴越春秋》序中指出:"其言上稽天时,下测物变,明微推远,燎若蓍蔡。至于盛衰成败之迹,则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议论,种、蠡诸大夫之谋,迭用则霸;子胥之谏,一不听则亡;皆凿凿然,可以劝戒万世,岂独为是邦二千年故实哉!"明代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也说:"呜呼!孟轲氏称'人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观二国之兴而愦,愦而兴,斯昭昭矣。骄畏之殊,兴亡所系;忠谗之判,祸福攸分。可畏哉!"二序都认为《吴越春秋》昭示了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具有"资治"、"劝惩"的意义。

的确,赵晔对吴越历史的描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反思,充满着对兴亡成败的历史哲学的思考。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来完成的。

一　建构审美时空形态

《吴越春秋》现存 10 卷,内传 5 卷记载吴国历史,从吴国远祖后稷诞生到夫差败亡,外传 5 卷记载越国历史,从大禹治水到越国灭亡。细读此书,我们发现,赵晔对吴越两国历史的记叙不是平铺直叙、面面俱到的,而是有所侧重。

从吴国历史来看,后稷诞生到王僚立为吴王,历史时间超过一千年,字数约为 1800 字;公子光弒王僚自立到夫差败亡,历史时间为三十四年,字数约为 18000 字。对越国历史的叙述,又是怎样的呢?前面一卷,从越国远祖大禹出生到越王元常立,历史时间也超过一千年,字数约为 1900 字;后面四卷,记叙勾践入臣到称霸的历史,时间为二十三年,字数约为 17000 字。勾践之后历八世为楚所灭,二百多年历

[收稿日期]　2012-04-20
[基金项目]　2012 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巫文化视野中的先秦两汉史传研究"资助(编号:2012B170)
[作者简介]　林小云(1975-),女,福建晋江人,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史,字数不到 100 字。很明显可以看出,历史时间和叙事时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如果我们再换个角度,以年为单位来看,我们也会发现在相同的时间单位内,作者叙述内容的多寡是有很大悬殊的。例如寿梦五年,只用了“伐楚,败子反”五字,余祭十六年,只用了“余祭卒,余昧立”六字,但王僚五年,仅仅写伍子胥奔吴一事,就用了两千字,而全书记载内容最多的一年,即勾践二十一年,竟长达三千七百字。在面对历史的现实时空时,作者既可以让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历史跨度在一个瞬间的叙事中完成,也可以让时间慢速运行以增加情节密度,完全打破客观历史时间的均匀性。

具体来说,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划分,我们都会发现,在作者所描写的吴越历史中,阖闾、夫差时期和勾践时期,尤其是勾践时期,在相同单位时间里描写的扩张幅度远远超过其他历史阶段,形成了《吴越春秋》叙事时空结构中强化的部分。在这里,它艺术地再现了吴越争霸斗争的历史画面,完成了几个主要人物性格及命运的塑造,是《吴越春秋》艺术创造的精华所在。这正是《吴越春秋》叙事时空与历史上的现实时空形态的差异,也是其叙事结构的审美特点。

那么,因何会出现这种审美与现实的时空差呢?这种叙事分量前轻后重,叙事时间前快后慢,在相同单位时间里叙事内容的多寡有着巨大悬殊的原因何在呢?作为反映历史的作品来说,这里,当然和历史材料搜集的难易丰薄有关系。一般来说,时代越久远,历史材料当然就越少,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也就越简略。但是,更具本质意义的是,作者对叙事时空的调控,是和作者的创作主旨紧密联系的,具体来说,是和作者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和审美创造的需要紧密联系的。

首先,作者对吴越两国历史的独特认识深刻地影响了作品的叙事时空形态。春秋末期的这场吴越两国的争霸斗争,留给后世的历史教训无疑是相当深刻的。作为儒家学者的赵晔,显然是想通过对这场斗争的叙写,对吴越两国盛衰兴亡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予以揭示,使之对后世产生一种深切著明的劝戒作用。

正是在这样一种创作主旨的指导下,《吴越春秋》才出现了叙事分量前轻后重,叙事时间前快后慢的现象。吴越两国虽然都是古老的国家,但它们真正进入中原诸国的视野,对春秋各国的局势产生影响,吴国是在阖闾、夫差时期,越国是在勾践时期。此前的吴国、越国仅仅是东南地区的两个蛮夷小国,对中原地区的影响相当的小。吴国在阖闾时期得到伍子胥的帮助,国势迅速强盛,在与楚国的战争中直打到楚国的郢都,逼得楚昭王逃亡,几乎灭了楚国;在夫差时期更是达到国势强盛的最高峰,在艾陵之战打败齐国,并与晋定公在黄池争长。至此,春秋时期的三大强国均败在吴国手下,吴国国势可谓如日中天。但也是在夫差在位时,吴国被越国所灭。吴国是如何强盛起来,又为什么在国势最为强盛之时,急剧败落,被越国所灭?同样的,越国是如何在吴越斗争中反败为胜灭掉吴国并横行江淮的?从吴越这两个国家的争霸中能得到些什么教训?这些都是作者想要通过这部作品给后世以历史的昭示的。

因此,作者将主要笔墨放在阖闾与楚国、夫差与勾践的斗争之上,通过对阖闾如何在伍子胥的辅佐下励精图治终于打败楚国,夫差如何穷兵黩武、不听伍子胥的忠告而招致灭国亡身以及勾践在兵败会稽后如何卧薪尝胆,图谋复国,并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灭吴雪耻的描写,来揭示吴越两国盛衰兴亡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

其次,历史的现实时空虽然为叙事时空提供了创造的基础,但审美创造的需要却发挥着叙事主体的作用,直接改变着历史的现实时空。

夫差和勾践这两位吴越争霸的主角,虽然即位时间只差一年,但在作者笔下,夫差只写了一卷,而描写勾践竟用了四卷的篇幅,情节有“入臣”、“归国”、“阴谋”、“伐吴”,极其详尽。实际上,在史书中,《左传》对夫差的记载大大多于勾践,《国语》则勾践多于夫差,《史记》则大致持平。而在《吴越春秋》叙事结构的时空关系中,勾践占据了中心地位,是被强化了的对象。夫差与勾践的故事含有很丰富的历史教训。夫差虽然败越、伐齐、会晋,国势如日中天,但因拒不听忠臣伍子胥的劝告,穷兵黩武,丧失民心,终使国力迅速衰竭,被越国所灭。勾践在兵败会稽后,虽然曾一度消沉,但终于忍辱入臣于吴,得返越国后卧薪尝胆、与人民同甘共苦,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雪耻。二者的反差何其之大!作者显然十分看中这其中的历史借鉴意义,所以在叙述夫差败越后骄奢淫逸、穷兵黩武终于招致灭国后,把重点放在勾践身上,在史籍点滴记载的基础上,融合大量的民间传闻,运用想象与虚构的手段,浓墨重彩地铺叙了勾践入臣于吴时如何卑躬屈膝,甚至不惜为夫差尝粪疗疾,终于取得夫差的信任得返越国及回国后又如何卧薪尝胆、苦心焦思,以报吴为念,并与范蠡、文种等大臣一起行伐吴的阴谋“九术”,终于消灭了吴国,并北上称霸中原。

作者正是通过对勾践二十年艰苦斗争的描绘,与夫差的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形成鲜明的对比,塑造了一位忍辱复国的政治家、阴谋家的形象,揭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和历史的哲理。

可见,赵晔对历史进行反映时,所把握的不是历史客观时空的全部,而是其心理结构所选择和接纳的那一部分,即审美创造需要的那一部分。历史的客观时空形态经过作者的头脑过滤后,进行一番取舍和改造,认为不必要的时空采取了简化处理,而必要的时空却又被拉长和延伸。这就形成了历史时空形态和叙事时空形态的差别,而制约这一差别的,正是赵晔的情感、思想以及创作宗旨。

二　建立“包举大端”的开头形态

史家巨擘司马迁作《史记》,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为了达到这个著述目的,他精心设计了一个独具匠心的叙事结构,“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4]。在这样一个叙事结构中,司马迁以十二本纪开头,并以《五帝本纪》把叙事时间推向非常渺远,是包含着深刻的用心的,是以它来包举大端,法天则地,原始察终,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著述目的的。

赵晔作《吴越春秋》,虽没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气魄,但无疑也是想借对吴越历史的记载来昭示兴亡成败的历史教训,体现自己对历史独特的思考。因此,《吴越春秋》的开头也体现了赵晔的深刻用心。

《吴越春秋》的重点在叙述春秋末期吴楚之间和吴越之间的争霸斗争,但作者却从遥远的传说时代写起,形成远古神话传说与真实历史交织的叙述。卷一《吴太伯传》在叙述了吴国远祖后稷神奇的诞生故事及其为尧农官并立国为诸侯的传说后,着重叙述了太王之子太伯和仲雍为了成全太王传位于季历之子昌的心愿,托名采药于衡山,遂逃归荆蛮,建立句吴的让国高风。卷二《吴王寿梦传》叙述了吴王寿梦至吴王僚的这一段历史变迁,其中着重写了寿梦之子诸樊、余祭、余昧为了完成寿梦传位给季札的心愿而竞相逊国及季札不受国而逃归延陵的高风亮节。卷六《越王无余外传》叙写了越始祖鲧到越王元常的这一段越国的历史,其中浓墨重彩铺叙的是鲧禹尤其是大禹治水的神奇传说。《吴王寿梦传》最后引出了吴王僚,《越王无余外传》最后引出了越王元常,而全书也才进入了叙事的真正主体。应该说,卷一《吴太伯传》、卷二《吴王寿梦传》和之后的《王僚使公子光传》、《阖闾内传》、《夫差内传》,卷六《越王无余外传》和之后的《勾践入臣外传》、《勾践归国外传》、《勾践阴谋外传》、《勾践伐吴外传》,是不属于同一个叙事层面的。内传卷一、卷二的时间跨度是千百年,每卷都是几百年;卷三、四、五的时间跨度是三十四年,每卷平均才十几年。二者的时间流转速度相差几十倍。如此巨大的叙事时间流转速度的差距,导致了这两卷和主体部分的后三卷具有不同的形态。

前两卷在巨大的时间流转速度中着重渲染的是吴国先辈的礼让之风,思考的是儒家所注重的仁义礼治。吴的礼让开了兄终弟及之例,也为日后的同室操戈埋下了祸根。接下来主体部分的三卷以极其细密的笔触写了公子光弒王僚而自立和夫差争位,吴国的礼让之风至此已荡然无存。但夫差尚标榜仁义,企图怀小服远,终于给了越王勾践复仇的机会。吴国的兴盛自礼让始,这种礼让之风是赵晔所深深称许的;然而可悲的是,吴国的败落也部分是由于夫差的标榜仁义。这是夫差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作为儒家学者的赵晔,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反省着自三代以降的历史中仁义道德的沦丧。同样的,叙述越国历史的五卷中,卷六的时间跨度也是千百年,后面四卷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二年,平均每卷是五六年,时间流转速度的差距更大。卷六在巨大的时间流转速度中突出的是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虽与主体部分的勾践复国故事没有多少直接联系,但它着重凸现的大禹身上那种忍辱负重、顽强不屈、厚生爱民的精神,却笼罩着后文主体部分中对勾践复国的描绘。正是勾践身上所具有的这种越民族与生俱来的忍辱负重、顽强不屈的精神,加上在复国的过程中施行的一系列争取民心、士心的仁政,才使越国能历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吴雪耻。这样的叙写,沟通了神话与现实,既展现了古越民族“隐忍以成事”的民族精神,又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历史法则。

可见,内外传的这三篇传记,虽然与全书的主体部分属于不同的叙事层面,但它们把时间的触角,伸向渺远的神话传说时代,在对历史兴衰的描写中,反省着历史道德、历史法则,使全书充满着既苍凉又悲壮的气氛。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三卷所展示的巨大的时空视野,书中所渗透的那种历史反省意识和历史盛衰感就不会如此强烈。

“中国人对一部作品、尤其是大作品的开头,是非常讲究的。……中国著作家往往把叙事作品的开头,当做与天地精神和历史运行法则打交道的契机,

在宏观时空、或者超时空的精神自由状态中,建立天人之道和全书结构技巧相结合、相沟通的总枢纽。”[5]如《史记》以十二本纪开头就是如此。《吴越春秋》虽然称不上大作品,但其卷一、卷二和卷六却是这样一种带有时间整体性观念和超越的时空视野的开头形态。它的大跨度的时空操作及其带来的独特的叙事效果,使得全书不仅仅停留在对吴越两国这段历史的叙写与评价上,还具有了一种充满浓烈反省意识和兴衰感的历史哲学的思考,从而形成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吴越春秋》展现了赵晔的叙事智慧。书中通过审美时空形态的建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意蕴丰厚的艺术世界,传达出赵晔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展现了一个儒家学者借古鉴今的时代关怀。其独具匠心的开头形态,带来了独特的叙事效果,具有超越文字的意义,揭示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宋]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2] [汉]袁康,吴平.越绝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M]//汉书·司马迁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4] [唐]刘知几.史通·二体[M].[清]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9.

Narrative Strategy of “Wuyuechunqiu”

LIN Xiao-yu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unique narrative strategy of “Wuyuechunqiu” well reflects the author’s creative intent. The narrative strategy shows as: constructing an aesthetic space-time form, showing causality of rise and fal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WuYue, revealing the life and history philosophy of thriving in calamity and preishing in soft living; establishing a beginning form which covered the end, so that the book has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s thinking which filled a strong reflection consciousness and sense of the rise and fall.

Key words: narrative strategy; aesthetic space-time form; beginning form